第一章

蒋介石从“剿共”的位置上转过来

1. “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寇入侵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标志，也是蒋介石从“剿共”的位置上转过来的开始。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比较了解的。早年（1907年），蒋介石留学日本，对日本的国情开始有了了解。有的书记述：“盖当先抵日之后，道途观察，虽仅及其表面，然可窥见日本政府施行新政之效力，故决定除在学校学习一切外，一有余暇，即竭力设法以研究日本军事、政治、工商、市政及外交上各种方略之内幕，并往参观各种机关之管理，录之于书，而备他日改造本国之借镜。”① 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赴日，对日本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一年9月29日，蒋介石携张群、宋子文、

①秦瘦鸥：《蒋介石全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宋美龄及副官孟超然、留日同乡孙鹤皋、机要秘书陈舜耕等离开上海去日本。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 1927 年 10月 4 日编撰的报告书《国民党统一问题》记载：“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日由上海来到长崎目下至少云仙静游；虽然宣称还要去美、德、法等国，但由于正在为将来画策之际，所以欧美之行，尚难肯定。”这一天，蒋介石对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将来之计划。且余之友人居日者甚多，欲乘此闲暇之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与日本诸名流相晋接，此外则并无何等之目的。关于此后之事，尚无何等决定。现拟赴云仙小住，暂事静养。”蒋介石到达日本后，到云仙宝塚、奈良、神户、大津、箱根大涌谷、小涌谷、汤本、芦之湖、河口湖、热海、伊东、东京等地转了一圈。他认为：“日本进步之速可惊，社会秩序与教育亦均有进步。未至日本以前，以为其物质进步，精神必衰退；今乃知其兴盛犹未艾也。”他很感慨地说：“日本建设猛进，不知吾国何日乃能臻此耳！”他认为日本对华的方针归纳起来有 5 点：“（1）满蒙经济发展。(2) 满蒙为日俄战争牺牲所得来；日俄之战，为东亚存亡之战。日本之侵略中国，即基于此观念之误，而漠视中国革命进步之环境。（3）投资满洲交通实业，谓中国人皆受其惠。（4）不在政治上吞并满洲，致担负义务。(5) 须保留其在满洲之权利。”他又认为日本对华政策有三点错误：“（1）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2）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3）利用无知军阀，压制民众。”

10月 23 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要求日本方面对于其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反省，呼吁中日圆满合作。蒋介石首先说：“中正遵奉中国国民党孙总理之遗嘱，从事于中国国民革命，与贵国人士睽违久矣。此次辞职周游，先来贵国观光，对于各种事业之进步，良用钦佩。至个人此来，辱荷各界人士竭诚优遇，尤深感谢。”接着，蒋介石说了一大段话：“窃忆我孙总

理尝称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无论在任何方面观察，均有唇齿相依之关系。中正深信贵国国民，希望我中华民族之解放与独立，必较他国国民尤为真实，且贵国人士提倡中日两国之亲善，已有多年，惜乎未得其道，故至今尚难实现。此我两国有识之士莫不引为憾事者也。中正尝以为欲期中日亲善之实现，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障碍维何，厥为中国国民所共弃之军阀也。”“惟其间有不明中国国情之国家，不顾东亚之安危，徒眩惑于目前短小之权利，利用我国民所痛心疾首之万恶军阀，以间接压制我民众，阻挠革命与新兴势力之膨胀，而连结国际永久不解之仇恨，以贻我东亚民族无穷之耻辱。”“吾人确信我中日两国根本之亲善，非利用军阀所能成功，亦非少数人互相结合所能奏效；必待我两国国民与国民间，有自动的及自觉的精神之团结，乃能达其目的，是以吾人今后努力亲善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将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之援助，是实为我革命进行莫大之助力，亦即我两国根本亲善之良谟也。否则军阀之恶势力一日不除，我国国民必多增一日之痛苦，国民革命之完成固因之延长时日，而我两国之亲善亦无从实现，其影响于东亚全局之大，固不待言，而最近世界之战祸，亦将胚胎与其间，是诚足为我两国前途忧也。”

日本对蒋介石的呼吁置之不理，正如日本产经新闻社古屋奎二说：“日本军阀充耳不闻，毫无接受之意，只顾疾足狂奔，一如预言所指——把全世界卷入了战争的惨祸。”①

这次在日本，蒋介石开始了一些实质性的接触。蒋介石通过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进行秘密商谈，始终参

①〔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535 页。

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蒋介石同田中义一会谈是 11 月 5 日下午 1 时半在东京青山私邸进行。蒋介石与张群同去，日方佐藤安之助陪席。谈话经过由佐藤记录，并于同月 14 日由日本外务次官出渊函送驻华公使，驻上海、汉口及奉天各总领事参考。这次会谈中，田中义一表示对蒋介石“将不惜充分援助”，其先决条件：一为蒋介石必须反共。田中义一说：“日本对贵国之内争一切不加干涉，然在贵国有共产党跋扈，则断难旁观。”二为蒋介石必须“不牺牲日本之权利”。三为蒋介石“先行巩固南方”。田中义一说：“时至今日，最善之策，依然是先统一长江以南，俟基地巩固，再着手北伐。”田中义一又说日本并未帮助张作霖，只不过“日本之所愿惟在满洲维持治安而已”，换一句话说：你蒋介石可以北伐打张作霖，不过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必须照旧。蒋介石不仅把田中义一作为“前辈”看待，而且对田中义一所谈明确表示：北伐可以暂不进行，日本在华的权益可以维护。蒋介石说：“本人如共产党跋扈则再起，否则纵令孙南下亦决心不再起”，“军队内有共产主义者侵入则不胜寒心”，“对于不可从今立即北伐之高论，全然有同感，俟南方巩固而后北伐，亦然”。“首相言中曾谓不得牺牲日本之权利，本人亦相信在中国之日本利益如得安全，则中国之国利民福亦可安全，两国之利害毕竟共通者也。”不过，蒋介石认为必须进行北伐打垮张作霖，“则满蒙问题既易解决，排日亦可绝迹”。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同日本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1）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2）蒋决定反共到底。（3）日本支持蒋政权。（4）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又说：“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后日交

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①]据说在中华民国总统府保存的档案中，有此次会谈的一问一答的记录。当田中义一问蒋介石“来日之抱负”时，蒋说：“余之意有三，第一：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心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胥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第二：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②]

但是在 1928年，当蒋介石率部举行第 2 次北伐时，5月却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5月 1 日，北伐军克复济南。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日侨，出兵占领胶济路及济南，企图阻挠国民革命军前进。蒋介石一面严令部队注意军纪和各军驻扎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时及随员 10 余人到日本驻屯军福田师团部交涉。不料，“五月三日，我军于占领济南后，正从事渡河北上之准备，日军突然袭击我军，围攻我交涉公署，惨杀我交涉员蔡公时，全市邮电机关亦被占领，复向我提出，济南我军一律解除武装，及附近二十里以内不得驻兵种种无理要求，且不待我答复，即开炮轰城，我军不得已退出城郊，军民死伤万余，财产损失无算，造成我民族史上奇耻大辱”。[③] 蒋介石在《誓雪五三国耻》中说：“日本人那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对于我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样的暴行，谁亦想不到的。……这次日军暴虐的行动，就是世界各国，也都晓得了他们是一种最野蛮的军阀。”对此，蒋介石一面同日本交涉，

① 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李宗仁回忆录》，下册，1980年编印，第 548～549 页。

② （台）“国防部”史政局：《蒋总统秘录》，第 1540 页。

③ 《北伐战史》，第 116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面命令部队“绕道渡河，继续北伐”。就交涉来说，经过 11 个月的周折才解决。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济南事件以来……日中邦交处于断绝状态……中国正在大举排日，贸易也已停止，尤其是与中国交易繁复的大阪经济界简直是一筹莫展。”“解决这样事件的条件，照例是采取使对方道歉、赔偿，并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但是，解决济南事件时日本方面的方针是：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也可同意。’①

尽管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侵华的行径有这么早与这么深的了解与接触，但南京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干的却是“攘外必先安内”。

1931 年 7 月 2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中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生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9 月 1 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使命。”

当时东北的敌我态势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

①《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5 页。

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其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而我方，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①]。1931 年七八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卖，又转过来反张，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②]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来越明显。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

① 张学良于 1931 年 5 月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后，因患重伤寒症入北平协和医院医治，原打算 9 月返沈阳，后闻日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要暗杀他，就继续留在北平。

②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 页。

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回沈阳后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到沈阳时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 16 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① 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①② 到了 9月 12 日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电告说，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 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①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 6辑。
②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他 9月 23 日在致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电中说：“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第二，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既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第三，先要安内。他在 9 月 28 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0 月 10 日，蒋介石在双十节手书救国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到了 11 月 30 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的态度，集中到一点，即是对日寇的入侵采取“不抵抗主义”。

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九月十八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讯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职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

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致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冯玉祥当时避居山西汾阳，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个时候被蒋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的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①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要蒋介石出兵抗日。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常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故意与政府以难堪。唯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其行动越轨者，亦足以警察徒手驱散或弹压之而已。”② 打电报到南京提出质问、警告的更是像潮水一样。顾维钧说：“我不但受到学生团体和代表们的质问，而且受到潮水般的来自全国的电报质问，这些电报把直接谈判的计划说成是为委员长保持政权的阴谋。那些发电报的人认为我只是为委员长的政治计划服务的工具，我记得江苏省同乡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表示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警告

①《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425页。
②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27页。

我，如果我不改变态度，就要毁掉我的祖坟。”“我记得上海各界联合会和上海市商会发给我的电报，对我提出的直接谈判的方针也提出了警告。”①

这时的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再加上宁粤分裂和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头在南京、广州和上海召开，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

1931 年 12 月 15 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在京的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于右任任主席，作出了决议：“（1）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请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② 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2）考试院长戴会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陈布雷在日记中说，蒋介石“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③会后，蒋介石发表了辞职通电，说他提任国民政府主席三年来“无日不思竭其愚庸，实现总理之遗教，无负党国之付托”。特别提出：“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昔因顾虑政治中断之危，愿为党国忍垢负责于一时者，将转为同志团结与党国统一之梗。且使外交政策，日滋无责任之批评。莫衷一是，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权衡轻重，不

①《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 424 页。

② 宁粤分裂时林森尚在国外，被列名参加了弹劾蒋介石的提案，上海和平会议时才回国，不预闻宁粤任何一方的争论，表现了超然的地位，蒋介石就看中这一点，选了他来代理，林森一代就当了 12年的主席，直到他去世。

③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2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他又表态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①] 同日，林森和陈铭枢联名发表就职通电，各地中委纷纷入京。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于右任致《开幕词》，孙科致《闭幕词》。蒋、胡、汪三派表面上实现了统一。会上，通过了改组中央常委会、中政会常委会案。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均为中政会常务委员。孙科在《闭幕词》中大讲了这次全会“无论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同志，都相率来京，集合一堂，决定党国今后的方针”。还特别表扬了蒋介石，说：“这一次党内同志能够得到精诚团结的结果，我们又不能不想起蒋介石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如无蒋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也不能感动全体同志，有此良好的机会，使大家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回想这几天内开会精神之良好，结果之圆满，不能不对蒋介石同志表示最大的敬佩。”

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就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去了。蒋介石在行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蒋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难。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同时，蒋又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既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

①蒋介石：《自反录》，第二集，卷三，第349—350页。

2. 怎样对待“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在南京只剩下孙科政府。孙科在财政和对日外交这两个问题上无计可施。在财政问题上，孙科自掌政府后，由黄汉㭎署理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交职时带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部内科长以上职员一律发薪 3 个月暂时离职，使财政部剩下一个空招牌。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因东北被占以及税款在广东、山东、湖北等省被扣，每月收入只有 600 万元，而军费一项每月就要 1800 万元。蒋介石授意何应钦天天向孙科要钱。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孙科计划暂时停付内债本息。上海银行界是给南京政府的公债养肥了的，停付本息对他们当然不利，于是一致起来反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声明要以停止交易相要挟。这一切，证明了广东资产阶级的力量是薄弱的，没有独立掌权的经济基础。汪精卫也好，胡汉民也好，孙科也好，只有心甘情愿地去当蒋介石的“叔孙通”，要独立掌权是不可能的。所以，孙科固守石头城，一筹莫展。在外交问题上，孙科用陈友仁代顾维钧任外交部长，要张学良保卫锦州，建议同日本绝交，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这时，日本已决心要在中国东南发动武装进犯，长江中的日本军舰扬言一有事态就向南京开炮。孙科处在一个朝不保夕的危城中。实际上，财政与外交这两个难题是蒋介石下野时给孙科政府的两道催命符。

1932 年 1 月 2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紧急会议，依据会议决定由林森、孙科邀请蒋介石重返南京，共商大计。孙科给蒋介石打了一份电报，说：“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国事不易收拾，先生平昔爱党爱国，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望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孙科自己也悄悄地坐上去上海的火车，离开南京。孙科

政府就这样夭亡。

同年 1 月 18 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在杭州西湖幽静的烟霞洞举行了会议。蒋介石对汪、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呈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节，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① 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长组织行政院。 20 日，汪精卫到了南京，第二天蒋也到了南京。蒋介石在离杭时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余此次晋京，个人当然苦痛。然国事如此，亦不能计个人之苦痛。…… 当为公义私交而尽力赞助政府，共纾国难。” 26 日，蒋介石约汪精卫晤谈，对汪说：“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织行政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各位，竭诚相助。”28 日，由蒋介石主持中政会议，通过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的决议。

就在 1 月 28 日，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当时南京政府毫无准备，下关日舰一声炮响，只得迁都洛阳。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了。

蒋介石怎样对待这场抗战呢？他是一面主张抵抗，一面又进行妥协。

主张抵抗这一面，一是发通电，发指令；二是组军参战。

1932 年 1 月 30 日，蒋介石发出了《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这个通电是在十九路军发出艳电后，当天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群集溪口献计，要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国人反对。不过这个通电还是表白了蒋介石的态度。他说：“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

①《蒋总统秘录》，第 1898 页。

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表示：“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维，公身虽在野，犹愿与众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蒋介石重新上台到了南京后，就在 2 月 5 日致电何应钦（当时军政部长）说：“如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我空军亦应参加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使敌猝不及防。”16 日又致电宋子文（当时财政部长）说：“日本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始，究至如何程度，均难逆料。而江西与河南之接济必完全断绝，请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至崩溃，望设法助成之。”

2 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张治中（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去浦口迎接蒋，就向蒋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立即表示“很好”，并关照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个师合成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参战。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战，是有种种原因的。原先，面对淞沪抗战，在南京开会商议怎么办时，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都在会上讲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话，主张要珍惜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中央派兵参战，蒋介石始终一言

不发。那么为什么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呢？按宋希濂说：“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重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抵抗了日军六七万人和 200 架飞机的进犯。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 33 天。

在激烈的抗战期间，蒋介石曾在 2 月 18 日电勉第五军全体将士与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电文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只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诚，真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① 同月 23 日，蒋介石曾电勉淞沪抗敌各将士。电文说：“日军倾力进犯，狼奔豕突，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河山，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之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

①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31—32 页。

属难能可贵。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故革命之异彩，争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中，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助，奋斗到底。”25 日，又致电蒋光鼐谈及军队布署。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3 月 1 日至 6 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由汪精卫主持，讨论上海战事，决定对日方针，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就职视事通电说：“国难至此，遑计短拙；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

进行妥协这一面，活动十分频繁。

“一·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良才一同找蔡廷锴，说张静江有事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谈。蔡到杜家时，张静江对蔡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廷锴当即对张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史二人从中缓和，不欢而散。很显然，张静江的行动，是蒋介石所授意的。事变发生的前一天，即 27 日夜，何应钦、朱培德（当时为参谋总长）给蔡廷锴连发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还密令宪兵第六团于 1 月 28 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